

国际政治修辞¹

菲利普·赛拉泽 (Philippe-Joseph Salazar)
(开普敦大学修辞学研究中心, 7701, 南非)
赵欣琦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100871, 中国北京)

1.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修辞学理论家, 我想谈谈对政治修辞的一些看法。需要承认的是, 公共或政治修辞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语义的伪造、创造、传播和储存。²

那么首先, 什么是“语义”呢?

作为前言请允许我提到弗雷格, 他阐释了涵义 Sinn 与意义 Bedeutung (“事实”, 如科学家等专家共同认可的事实, 下同) 的不同之处, 并举出一个语言学家众所周知的非常古雅的例子: 金星既是大多数欧洲人所谓的“晨星”, 也是“长庚星”——这取决于观察者——但是不论它叫什么, 它都是“金星”。主观者(早上或晚上, 这取决于你在地球的哪一边)看到的是“感觉”(涵义), 客观者看到的是“事实”(意义)。

例如, 大马士革圣约翰指出, 阿拉伯异教徒将其崇拜的女神称为晨星, 直到穆罕默德先知使其皈依伊斯兰教并改称之为“长庚星”(《可兰经》LIII)。³换言之, 穆罕默德仅通过对一个信仰的重新命名就驳斥了整个异教。这就是修辞学的胜利。

¹ 本文为菲利普·赛拉泽教授 2012 年 10 月 23 日应邀给中国北京大学《汉语修辞学》课所做的讲座。

² This Seminar and Guest presentation is part of a research project under the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of South Africa, Number 73834.

³ Saint John of Damascus, *Writings*, ed. and transl. by F. H. Chase, in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New York: 1958, vol.38.

总之，修辞的语义（或者说感知）在于你打算用它来做什么：你可以用它来改变现实。相反的，在一个客观语言的世界中（比如天文学），无论你来自法国还是中国，某个星球存在的科学“事实”都不会改变。换言之，修辞感知总是由特定的发出者出于某种特定目的传递给特定的接收者。两个正在讨论用约定成俗的方法去检验事实或假说的科学家就不包括在上述情况中。

2.审慎地讲，政治或公共修辞的这种“特定”的性质，使我们的政治生活可以忍受，或者至少不会太糟糕，甚至于使“晨星”与“长庚星”共存。2005年法国公民全民公决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呈现在法国人民眼前的是以布鲁塞尔为中心的新帝国式的欧洲时，伴随着非政府组织的蓄意煽动，选民拒绝了被媒体和政府联合美化了的“唯一理性选择”，投了否决票。他们的行为正是“感知”与“事实”的政治博弈的体现。

不论是直接（通过大众投票）或模拟（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当提供给选民的政治选择被政客称为“别无选择”时（出自撒切尔夫人），感知与事实之间的博弈就会被激发。如2005年5月针对欧盟问题的法国全民公投，统治阶级面临失败时，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家经常求助于修辞工具，宣称需要民众需要更多教育。主权，也就是西方民主国家中的人民，被当做是不讲理的而被“感知”所绑架的群体。相比之下，专业的政治阶级极力维护客观事实。确实，经过理性选择理论的培训，所掌握的技术在企业或公共管理学院得到磨练的政治家，必须是客观事实的坚定信徒，无论他们在公众面前打的是“感知”牌还是其他的权宜之计。这个博弈的问题在于，希望代表18世纪理性主义，政府三权分立理论和人民主权理论的西方民主党事实上在修辞上总是在告诉人民，只要不威胁到国家安全或者所谓的“重要”问题，“感知”没什么不好。这仿佛告诉人们，西方民主中，人民并不是唯一至高无上的。例如人们拥有对于社区权利和宗教信仰的不同感知的权利，多样性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国家政治必须依赖于客观事实。这就是使用“科学”语言的优势，也是现代政府管理的特点。国际关系显然是用修辞去伪装客观事实的主要载体。⁴

⁴ See my edited volume on Diplomatic Rhetoric, *African Yearbook of Rhetoric*, 3 (3), November 2012.

下面我想用两个历史上的例子来阐述政客是如何推行事实，以及“感知”与“事实”之间的互动如何塑造了政治修辞。

3.第一个例子是历史上的，它源于法国大革命，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当时的英国首相威廉·皮特，他在1793年和1801年在下议院发表的演讲中，对于这项国际盛事的回应。法国大革命沦为了旧政权国际秩序和它的话语的“历史坟墓”，并且因为要表达一个新的革命形式的政府，它创建了一种新的国际关系语言。这种新形式和新语言就是宣传的对象，他们将被推行于“旧欧洲”的其它地方。

皮特的“演说”本质上是在试图使英吉利海峡对面正在发生的事情合理化。皮特给自己的任务就是，阐明一个能够提供给英国的政治家们关于革命的一个共同的认识，基于此政治家们能够建立起一种审议制度，来解决相关的英国非常规政治事件无从参考的问题。他所做的事情确定了19世纪剩下的时间内英国对于法国的修辞理解，一直到著名的“友好协议”外交开始。

用“感知”和“事实”之间的区别来说，深谋远虑的皮特和他的同事们，对于革命是什么样有一些概念，但是法国革命所代表的“事实”是他们无法理解的⁵。

换句话说，皮特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修辞任务，即指导下议院，使他们对国际关系新转变进行慎重的回应。这是因为他意识到法国大革命所引起的国际危机的根源在于，法国大革命宣称自己是“普世的”。此外，革命派声称，他们的声音是现代政治的唯一理性语言。

威廉·皮特在1793年2月发表的讲话中，阐明了革命的修辞利害关系。⁶

他的理由在于两个要点：第一，1792年11月签订的法国公约所写，“对于所有渴望恢复自由的人提供友爱和同盟……是一项对于人类怀有敌意的法令

⁵ Gottlob Frege, Gottlob, "On Sense and Meaning", in *Transl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P. T. Geach and Max Black eds., Oxford, OUP, 1980.

⁶ William Pitt, *Orations on the French War*, London ; J.M. Dent, no date.

(20⁷)”；第二，英国内阁对于法国大使国书的拒绝，是基于法国正“利用一切机会来分离英国国王和英国”的这一点，而且国书上是致给“英国”而不是“英国国王”（这与革命修辞一致）（31）。

皮特很显然看到了这个共和国是怎样以一种政治修辞引进了两种全新的、相互关联的元素，用他的话讲是“体系”（32）：普世性准则与对人民直接进行审议的肯定。这是通过革命战争在整个欧洲大陆建立法式共和国，然后在拿破仑的带领下完成欧洲行政和法律的重组的前提。

法国公约辩论的公开性也使得这种危险复杂化：新法国“大会通过的政府”立即公开发表了这次辩论的细节，而且这种做法与传统“老欧洲”的情况正好相反。“老欧洲”的做法是所有的决策将会秘密进行，经常到了决策已经实施或生效，甚至是为了使人们感到惊讶或者被欺骗时才被公开。皮特认为“这次法国公约过程的公开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愤怒、恐惧和厌恶的来源”（93）。共和国对于公共审议开放性的这种新认知，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即“自由国度”（法国）直接“召唤”姐妹国家，确实建立起了一个政治“事实”的新基准。如果你认为这和当代的政治无关，那么就想想美国国务院的惯用修辞手段：每当推翻或者对一个政府采取军事行动时，美国政府的表达是，在其看来这种支援是给予人民的，而不是给予专制政府的。从美国国务院的做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国际政治修辞正是从法国革命者的话语中脱胎而来的。

皮特说，“我不会承认这样的一个共和国”（94）。皮特了解所谓的“共和国”，但是这些知识和“事实”源于古罗马的历史。至于当代历史，即至今还被英国人称之为“美国叛乱”的独立战争，一个为共和制所创的全新词汇并没有产生。（在美国初期，其名称从“联邦”、“联盟”、“公会”、到更为常用的“帝国”之间常常变化，“共和国”并不是最受认可的关键词。）1800年2月，即波拿马掌握领事权后，皮特在演讲中说，领事馆是稳定甚至是独裁政府的一个例子，因其名称激起了一系列因其政治阶级共鸣的修辞共同点。如果这个政权受“永久波动”（317）从而前途未卜，那么至少它的语言在修辞上变得更为熟悉了。

⁷ Bracketed numbers are references to pages of the *Orations*.

4. 现在让我谈谈我的第二个例子。

我在这里提到的是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在 2006 年 8 月写给美国总统的信。当然西方的媒体跟随美国的反应，评论的是这封信是否被寄出，以及它是否被收到。⁸我不记得任何媒体追问过“寄这封信”到底意味着什么。伊朗伊斯兰教共和国的世俗领袖在最高领袖（也是宗教牧师）的指引下寄一封信给 G. W. 布什，一个被认为是基督教帝国主义共和国的领袖。

伊朗总统在信的开头和结尾中很好地展示了两个焦点：

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那些现存于国际舞台上的矛盾问题。人们一直对这些问题争执不休，在政治论坛和大学生中间更是如此。至今许多问题和争论仍旧没有答案，而这就促使我想讨论一下这些矛盾和争执，希望这能为其带来被解决的可能。……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世界各地的人们蜂拥而至，追捧一个焦点——这是全能的神。无疑通过对上帝的信仰和教义的先知，人们会征服他们面临的困难。我给你们的问题是：“你不想加入他们吗？”

我们有很多方式来解读这封信：可以把它看做是 1979 年以来两国总统之间的第一次直接交流，或者伊朗直接、公开与美国政府谈话的尝试。显然，美国政府并不承认这种说法。

这是怎样一封信？这是领导人之间呼吁改变心意，调整政策与变位思考的一封信。总之，这是试图改变信仰的一封信。

类似的信之前出现过吗？当然：事实是在伊斯兰(和受教化的基督徒)历史上，新阿拉伯帝国的领袖穆罕默德曾向古代罗马共和国的领袖赫拉克利乌斯大帝寄过这样一封信，呼吁对方皈依伊斯兰教。十七世纪时，这封信被摩洛哥领袖伊斯

⁸ Sources: http://news.bbc.co.uk/go/pr/fr/-/2/hi/middle_east/4983868.stm.
And <http://www.president.ir/eng/ahmadinejad/cronicnews/1385/02/19/index-e.htm#b3>

梅尔所模仿。他致信于法国的路易十四，伟大的太阳王神，建议他皈依，并称他采取与否取决于他的良心。⁹这些历史的相似之处对于西方政客来说可能并没有太大意义，但伊朗总统实际上应用了一种修辞手法。他用这种修辞方法暗示了东方外交的重要性。为什么呢？因为默罕默德写给赫拉克利乌斯大帝的这封信恰在异教徒的大本营——充斥着信教阿拉伯人的麦加垮掉之前寄出。而艾哈迈迪-内贾德写的信就在伊朗被联合国制裁之前寄出，彼时伊朗还在扮演者伊斯兰世界反对盲目崇拜亲美的沙特阿拉伯的卫道夫。确实，这是封布道信，是对皈依的敦促，植根于预言传统。美国人未能理解这种修辞，也没能用同样的皈依修辞来为自己坚守的“事实”正名。

5. 作为总结，我想回到修辞的西方传统上来。正如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 II 8 中所说，我们的修辞传统认为，修辞是一门技术（希腊语），或者是一门艺术（拉丁语）。因此，修辞作为一门技术应遵循一般原则：“艺术来源于本质[194a 21]…而通常，艺术完成本质所不能及之事[199a 15]。”¹⁰简而言之，修辞也能完善本质。什么样的本质呢？¹¹对于人类这些政治动物来讲，修辞“艺术”通过将政治明显化以实现我们的政治本质。修辞的成功就在于它表现出了相应的政治现象。那么修辞表现的是哪些现象呢？如果修辞艺术仅是将现象变为有说服力的论断，使已存在的证据在论证中取得胜利（实行政策，判决案例，推行价值观），那么这门艺术是不能充分实现政策的制定、公正和价值观的本质。修辞的使命存在于古希腊语和很多其他现代西方语言与唯独在德语语境中的“现象”的哲学区别中。这两种“现象”从康德到胡塞尔¹²之间的现代哲学中都是相似的，它们从海德格尔¹³这里开始分化。对于他来说，前者与后者永远不会等同，也就是说后者的本体本身永远不会外化，只有修辞才能使其表现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修辞有这项功能时，修辞能完善其本质。总而言之，我们的工作是让“感知”通过“事实”展现出来，而不是使“事实”在“感知”中出现。我认为，这是研究政治修辞，研究国际政治的最好途径，就如我上述的两个例子那样。

⁹ Quoted in my *Mahomet. Récits français de la vie du Prophète*, Paris, Klincksieck, 2005, x.

¹⁰ I quote from the Hardie-Gaye translation.

¹¹ I refer here to Françoise Dastur, entry *Erscheinung*, in Barbara Cassin ed., *Vocabulaire européen des philosophies*, Paris, Le Seuil/Le Robert, 2004, 372-377.

¹² Edmund Husserl, *Die Idee der Phänomenologie*, The Hague, Nijhoff, 1973, 116.

¹³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Niemeyer, 1963, 30.

Translated by Cindy Zhao